

#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 控规模、调结构与提效益

张曾莲 王莹<sup>1</sup>

**【摘要】**以我国 30 个省份 2000~2018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地方政府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模型，从行政成本的规模、结构以及效益三个方面实证研究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可有效降低政府行政成本规模，提高政府行政成本效益，优化政府行政成本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行政成本规模和效益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效率则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政策与政府行政成本的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

**【关键词】**预算绩效 管理改革 财政透明度 DID

**【中图分类号】**F8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21)—02—0139(07)

## 一、引言

政府预算是各级政府依据法律法规编制的、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后实施的、以财政收支为主的政府年度财力资源配置计划。<sup>[1]</sup>从建立预算绩效工作试点开始，我国的预算绩效管理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浅至深的过程。2018 年中央政府出台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政策性文件，标志着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sup>[2]</sup>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改革不仅可以有效抑制政府资金使用不当、管理结构混乱等问题，而且可以有效抑制贪污腐败风气、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升地区经济发展质量。

政府行政成本是政府在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服务以及进行管理活动过程中所耗费的各种经济资源。<sup>[3]</sup>政府行政成本投入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满意度，提升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与现代化水平。然而，近年来行政成本支出规模不断扩大，极大地加重了公众的负担。图 1 显示了近年来各省人均行政成本规模的均值，可以看出各省人均行政成本规模由 2007 年的 860 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2539 元，政府投入的行政成本规模不断扩大，如何抑制政府行政成本的扩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预算绩效管理的定量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案例分析、路径分析以及现状分析等，较少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探究政府预算制度对于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王银梅、张亚琼(2014)指出，改革预算管理制度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必要途径。<sup>[4]</sup>王海涛(2014)指出，及时跟踪和评价预算绩效实施效果有利于部门的自我评价与资金管理，同时可以提高政府的信息透明度。<sup>[5]</sup>孙懿(2018)指出，预算绩效管理政策的实施能够加快政府的支出结构调整速度。<sup>[6]</sup>刘柏源等(2019)运用 DEA 指数分解法，研究发现随着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政策的不断推进，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的效率不断提高，并且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财政效率支出水平差距较小。<sup>[7]</sup>

<sup>1</sup>作者简介：张曾莲，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王莹，硕士研究生，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政府行政成本优化研究”(19JHQ09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地方政府真伪隐性债务风险的识别、评估与控制研究”(FRF-MP-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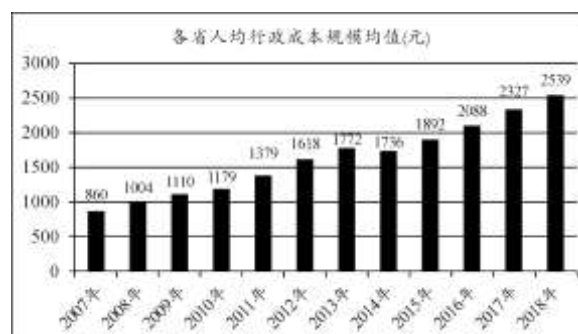


图 1 2007~2018 年各省份人均行政成本规模均值

学者们对政府行政成本也展开了研究，认为政府行政成本过高是公职人员过多、政府办公成本过高以及在职消费高的体现，因此过高的政府行政成本不利于政府行政效率的提升以及地区经济的增长，<sup>[8]</sup>往往伴随着奢侈浪费现象因而不利于政府绩效水平的提升。<sup>[9]</sup>也有学者指出，政府行政成本并非越低越好，政府的行政成本是政府履职的必要支出，应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以实现成本效益最优化。<sup>[10,11]</sup>本文以我国 30 个省份 2000~2018 年的财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地方政府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这一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从行政成本的规模、结构以及效益 3 个方面实证研究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政策对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

## 二、制度背景与假设提出

### 1.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2006 年，北京市出台关于《北京市市级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同时成立了相应的绩效评估办公室与研究中心，标志着北京市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正式开始。但早在 2003 年北京市便在企业实施了绩效考核系统的试点工作。2004 年，广东省出台《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行方案》，明确了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指导方针、内容路线与考核标准等。2012 年，湖北省颁布《湖北省财政支出效益评价实施办法(试行)》文件，规定各市县财政部门逐步开展预算绩效评价制度的试点工作。各省份具体展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时间见表 1。

表 1 部分省份预算绩效改革时间

| 地区  | 起始年份 | 地区 | 起始年份 |
|-----|------|----|------|
| 北京  | 2006 | 湖北 | 2002 |
| 天津  | 2007 | 湖南 | 2005 |
| 河北  | 2004 | 广东 | 2004 |
| 山西  | 2005 | 上海 | 2005 |
| 内蒙古 | 2007 | 四川 | 2005 |
| 辽宁  | 2004 | 江苏 | 2006 |
| 浙江  | 2005 | 云南 | 2006 |
| 安徽  | 2005 | 新疆 | 2008 |

|    |      |    |      |
|----|------|----|------|
| 山东 | 2007 | 河南 | 2004 |
|----|------|----|------|

## 2. 研究假设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是以成本效益为前提、以产出为导向的预算管理体系，资源的分配不再以人数为基准，而是将绩效评价的结果作为分配的依据。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可以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支出规模，提高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的效益，其原因在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遵循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公平性原则，是以结果为导向、以成本产出效益为前提所进行的改革。罗振军(2020)指出，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高了政府绩效监管水平以及资金的支出效率。<sup>[12]</sup>宫莹(2014)通过研究样本分析，发现通过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财政支出中行政人员支出比例明显下降，而用于民生建设的资金则显著提升。<sup>[13]</sup>说明预算绩效改革可以有效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成本支出，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而已有研究也表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于减少财政支出规模、改善财政支出结构、提升财政支出效率具有显著的作用。牛娇(2016)以广东省为样本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广东省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具有减缓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作用。此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推进可以有效抑制政府工作中的贪污腐败现象，提高信息公开度。<sup>[14]</sup>通过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地区的财政支出更加合理化，有效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

假设 1: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可以降低政府行政成本规模，改善行政成本结构，且对于行政成本支出效益有提升作用。

已有文献表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很好地解决了地方政府管理低效、资金使用混乱、资金使用不透明等问题。<sup>[15]</sup>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可以建立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由按人分配转变为按绩效分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政府管理人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同时建立了更加公开合理的资源分配体系。近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各级政府公开财政信息，提升财政透明度，成为改善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sup>[16]</sup>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可以有效控制财政支出规模、提升财政支出效率以及降低财政支出风险。<sup>[17]</sup>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提出：

假设 2: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通过提升政府的财政透明度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规模、提升政府行政成本的效益。

## 三、研究设计

### 1. 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 30 个省份 2000~2018 年的政府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由于西藏自治区在 2017 年才颁布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政策性文件，政策实施时间较晚以及各项经济数据缺失严重，所以未被纳入研究范围)，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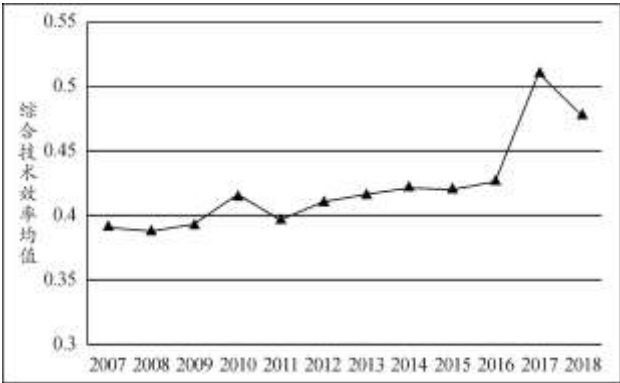


图 2 各省政府行政成本综合技术效率均值变化趋势

## 2. 变量选取

## (1) 因变量。

本文从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规模、结构和投入产出效益 3 个方面构建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代理变量。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规模定义为地方政府人均行政成本。<sup>[18, 19]</sup>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结构定义为一般公共服务占行政成本的比重。对于政府行政成本效益的衡量, 选择投入型 BCC 模型测算行政成本使用效率。投入型指标选取狭义的一般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两者之和, 产出型指标从发展指标和职能指标两个方面选取,<sup>1</sup>具体测算方法参考刘柏源等(2019)的研究。<sup>[20]</sup>运用 Deap2.1 软件得到各省行政成本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 图 2 显示了各省的综合技术效率的年平均值总体呈增长趋势, 2017 年达到了一个峰值而后有所回落。

表 2 变量定义

|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变量符号   | 变量定义                            |
|-------|----------------|--------|---------------------------------|
| 被解释变量 | 政府行政成本规模       | Cost   | 均值标准化后的人均行政成本规模                 |
|       | 政府行政成本结构       | Sc     |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行政成本的比重                |
|       | 政府行政成本综合技术效率   | Te     | DEA 投入 BCC 模型测算得出               |
|       | 政府行政成本纯技术效率    | Pte    | DEA 投入 BCC 模型测算得出               |
|       | 政府行政成本规模效率     | Se     | DEA 投入 BCC 模型测算得出               |
| 解释变量  |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时间虚拟变量 | Post   | 各省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政策实施以后年度取值为 1, 否则为 0  |
|       |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分组虚拟变量 | Treat  | 进行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赋值为 1, 否则为 0          |
| 中介变量  | 财政透明度          | Fi     |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公布的“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 |
| 控制变量  | 财政状况           | Cz     |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                       |
|       | 政府规模           | Size   | 政府公共收入/GDP                      |
|       | 人口增长率          | Growth | 人口自然增长率                         |
|       | 经济开放程度         | Open   | 进出口总额/GDP                       |
|       | 人力资本           | Edu    | 人均受教育年限                         |
|       | 人口密度           | Pop    | 每平方公里人口数                        |
|       | 地区虚拟变量         | Region | 东部地区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

## (2) 自变量。

构建政策实施虚拟变量  $post$ , 该省份改革起始时点及之后的年度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政策实施分组变量, 若省份为表 1 包含的改革省份, 则赋值为 1, 其他赋值为 0。其他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 2。

3. 模型构建

为检验预算绩效改革对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 即验证假设 1, 设定如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DID):

$$Y_{i,t} = \beta_0 + \beta_1 Post_{i,t} * Treat_{i,t} + \beta_2 X_{i,t} + \varepsilon_{i,t}$$

①

部分未实施政策的省份时间虚拟变量也赋值为 0, 为避免交乘项与分组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只在模型中保留交乘项。其中  $Y$  分别为行政成本规模、行政成本结构、行政成本效率,  $X$  代表各控制变量,  $\varepsilon$  为随机误差项。

为检验假设 2 的中介效应,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 研究的中介效应三步法, 检验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这一政策是否会通过财政透明度影响地区的政府行政成本。<sup>[21]</sup> 中介效应第一步模型包含在模型①中, 第二步与第三步模型如下:

$$Fi_{i,t} = \beta_0 + \beta_1 Post_{i,t} * Treat_{i,t} + \beta_2 X_{i,t} + \varepsilon_{i,t}$$

②

$$Y_{i,t} = \beta_0 + \beta_1 Post_{i,t} * Treat_{i,t} + \beta_2 Fi_{i,t} + \beta_3 X_{i,t} + \varepsilon_{i,t}$$

③

若模型②中系数  $\beta_1$  显著且模型③中财政透明度的系数  $\beta_2$  显著, 则中介效应显著。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

表 3 列示了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政府行政成本影响的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其中, 列 (1) 是以标准化后的人均行政成本规模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的回归, 交乘项系数为 -0.196,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政策显著降低了政府人均行政成本支出的规模。第 (2) ~ (4) 列中, 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在 1% 或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可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成本投入产出的效益。列 (5) 中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推行降低了行政成本支出在政府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以上研究结果验证了笔者的假设。从控制变量的角度来看, 财政状况、政府规模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于人均政府行政成本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财政状况越好、政府规模越大、人口自然增长率越高, 人均政府行政成本支出越少。

表 3 预算绩效改革与行政成本

| 变量         | (1)               | (2)              | (3)               | (4)              | (5)               |
|------------|-------------------|------------------|-------------------|------------------|-------------------|
|            | cost              | te               | pte               | se               | sc                |
| treat*post | -0.196***(-6.211) | 0.069*** (4.960) | 0.114*** (4.770)  | 0.032* (1.701)   | -0.068***(-8.841) |
| cz         | -0.073*(-1.932)   | -0.008 (-0.458)  | -0.054* (-1.878)  | 0.030 (1.311)    | -0.030***(-3.251) |
| size       | -2.214***(-2.865) | 0.264 (0.775)    | -2.339***(-4.005) | 1.545*** (3.362) | -1.028***(-5.474) |

|                    |                   |                   |                   |                   |                   |
|--------------------|-------------------|-------------------|-------------------|-------------------|-------------------|
| growth             | -0.065***(-7.851) | 0.024*** (6.613)  | 0.026*** (4.176)  | 0.012** (2.366)   | -0.007***(-3.583) |
| open               | 0.046(0.612)      | -0.109***(-3.302) | 0.218*** (3.856)  | -0.209***(-4.705) | -0.075***(-4.149) |
| edu                | 0.033(1.308)      | 0.048*** (4.268)  | 0.064*** (3.303)  | 0.011(0.734)      | -0.036***(-5.874) |
| pop                | 0.000*** (3.069)  | 0.000** (1.978)   | 0.000*** (13.019) | -0.000***(-7.804) | -0.000***(-7.634) |
| _cons              | 1.351*** (7.229)  | -0.171**(-2.077)  | 0.215(1.521)      | 0.223** (2.006)   | 0.813*** (17.901) |
| Adj_R <sup>2</sup> | 0.0391            | 0.0724            | 0.2064            | 0.1913            | 0.4531            |
| N                  | 570               | 570               | 570               | 570               | 570               |

## 2.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DID)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有共同的发展趋势,因此需要进行平行趋势检验。选取政策实施前的3年以及政策实施后7年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图3是平行趋势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系数在政策实施前在0附近波动呈下降趋势,说明对照组与实验组确实是可比的,平行趋势检验通过。政策实施当年及以后,系数有上升趋势,表明政策产生的冲击很可能在1年之内有提升效果,但1年之后,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3. 财政透明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财政透明度指数摘自上海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该报告于2009年以2006年省级决算数据为依据第一次出版,受数据区间的限制,截取2007~2018年的样本区间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4是中介效应的检验模型②和③的回归结果,第(1)列交乘项回归系数为3.763,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财政透明度的回归系数均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验证了笔者的假设,即财政透明度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与行政成本的关系中发挥负向中介效应,财政透明度越低的地区,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于行政成本的抑制作用越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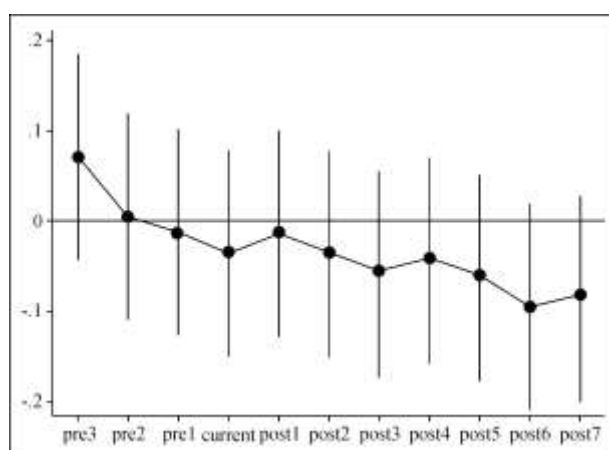


图3 动态趋势图

## 4. 异质性检验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不同，可能会对预算绩效改革与政府行政成本的关系产生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涉及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应选取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来测量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借鉴陆懿(2019)的做法，用熵权 TOPSIS 的方法测量区域的经济发展质量。<sup>[22]</sup>在模型中引入交乘项  $treat*post*quality$ ，表 5 列示了加入交乘项的模型的回归结果，交乘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发展质量越差的地区，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于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越大。

政府效率可能也会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与政府行政成本的关系产生影响。用  $Effi$  代表政府效率，用  $1-行政成本/财政支出$  表示，在模型中加入政府效率与  $Post*Treat$  的交乘项，即  $Effi*Post*Treat$  探究政府效率是否发挥了调节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交乘项系数分别为 1.456、0.076，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效率的调节作用显著。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

| 变量         | (1)                 | (2)                | (3)                | (4)                |
|------------|---------------------|--------------------|--------------------|--------------------|
|            | fi                  | se                 | cost               | sc                 |
| Post*Treat | 3.763* (1.666)      | -0.138*** (-5.315) | -0.035 (-1.262)    | -0.006 (-1.486)    |
| fi         | -                   | -0.002** (-2.537)  | -0.004*** (-4.120) | -0.001*** (-5.255) |
| 控制变量       | Y                   | Y                  | Y                  | Y                  |
| _cons      | -43.748*** (-3.428) | -1.014*** (-6.104) | -0.736*** (-4.184) | 0.392*** (15.913)  |
| Adj_R^2    | 0.1838              | 0.5934             | 0.6619             | 0.5816             |
| N          | 240                 | 240                | 240                | 240                |

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可能也会影响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与政府行政成本的关系，选取王小鲁等(2019)测算的市场化总指数评分作为衡量指标，其数据年份仅至 2014 年，以增长率为依据测算得到其余年份的市场化指数。<sup>[23]</sup>回归结果显示  $Market$  与  $Post*Treat$  的交乘项回归系数分别为 0.158、0.012，且分别在 1%与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越强。

表 5 调节效应

| 变量                 | Quality 调节效应         |                       | Effi 调节效应        |                       | Market 调节效应        |                       |
|--------------------|----------------------|-----------------------|------------------|-----------------------|--------------------|-----------------------|
|                    | (1) cost             | (2) pte               | (3) cost         | (4) pte               | (5) cost           | (6) pte               |
| Post*Treat         | 1.025***<br>(8.325)  | -0.039***<br>(-2.651) | 0.031<br>(0.159) | -0.090***<br>(-3.829) | -0.069<br>(-0.290) | -0.121***<br>(-4.280) |
| Quality            | 0.003***<br>(3.956)  | 0.000<br>(1.002)      |                  |                       |                    |                       |
| Quality*Post*Treat | -0.002**<br>(-2.108) | -0.000<br>(-0.722)    |                  |                       |                    |                       |

|                   |                       |                      |                       |                      |                       |                      |
|-------------------|-----------------------|----------------------|-----------------------|----------------------|-----------------------|----------------------|
| Effi              |                       |                      | -0.120<br>(-0.560)    | 0.016<br>(0.637)     |                       |                      |
| Effi*Post*Treat   |                       |                      | 1.456***<br>(4.625)   | 0.076**<br>(2.024)   |                       |                      |
| Market            |                       |                      |                       |                      | 0.005<br>(0.126)      | 0.004<br>(0.748)     |
| Market*Post*Treat |                       |                      |                       |                      | 0.158***<br>(3.891)   | 0.012**<br>(2.557)   |
| 控制变量              | Y                     | Y                    | Y                     | Y                    | Y                     | Y                    |
| _cons             | 24.364***<br>(60.029) | 0.986***<br>(20.087) | 24.497***<br>(61.048) | 0.977***<br>(20.389) | 24.063***<br>(53.062) | 0.940***<br>(17.393) |
| Adj_R^2           | 0.4294                | 0.2137               | 0.4579                | 0.2321               | 0.4921                | 0.2840               |
| N                 | 364                   | 364                  | 372                   | 372                  | 372                   | 372                  |

## 五、结论与建议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不但对于政府的支出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于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我国 30 个省份 2000~2018 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可以显著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规模且提高政府行政成本效益。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发展质量越低的地区，预算绩效改革对于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越显著。同时政府效率越高、市场化指数越高，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于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越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 继续坚持并深入贯彻预算绩效管理，积极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充分认识到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是减少政府行政成本、避免资金错配以及抑制行政人员贪污腐败的有效途径。政府各部门秉持“花钱必有效，无效必问责”的理念，对于提升财政支出效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具有重要作用。(2) 加强中西部等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升地区的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经济发展质量较差的地区往往伴随着更多的资金浪费以及较低的支出效率，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可以有效改善政府支出效率，提升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3) 努力提升政府效率以及地区市场化水平，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政策效果。目前，我国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仍处于初级阶段，应采取由点到面、由浅至深的方法逐步完善我国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制度并提高绩效评价过程的科学性。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应因地制宜，结合地区的发展逐步建立并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 参考文献：

[1][4] 王银梅，张亚琼. 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J]. 宏观经济研究，2014, (06):29-34, 62.

[2][7][15][20] 刘柏源，丁志伟，张洁.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省级财政支出影响——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分解法[J]. 地方财政研究，2019, (02):34-42.

---

[3]张曾莲,张敏.政府行政成本提升政府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2010—2015年省级政府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7,(05):73-78.

[5]王海涛.推动预算管理制度创新实施预算绩效管理[J].财政研究,2014,(09):2-4.

[6]孙懿.基层央行加强财务预算绩效管理的策略研究[J].现代金融,2018,(11):28-30.

[8]幸宇.县级政府行政成本规模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剖析[J].财经科学,2012,(06):80-88.

[9]温美荣.勤俭从政与政府行政成本关系研究[J].行政论坛,2014,(02):51-55.

[10]赵爱英.落后地区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绩效研究——基于天水市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39-45,50.

[11]董建新,余钧.中国行政成本的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分析(2000-2009)[J].中国行政管理,2012,(06):112-117.

[12]罗振军.夯实预算绩效监管提高财政资金效益——以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为例[J].财政监督,2020,(10):69-71.

[13]宫莹.湖北:创新高校预算管理模式[N].中国财经报,2014-06-24(005).

[14]牛娇.广东省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16]郭玲玲,王东辉.财政透明度、政治关联与政府补助——基于反腐败背景的研究[J].财会通讯,2019,(15):87-90.

[17]杨雅琴.财政透明、财政管理与良好的国家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当代财经,2017,(06):28-35.

[18]罗文剑.城市化发展与行政成本控制——兼谈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职能限度[J].理论月刊,2014,(11):88-91.

[19]张曾莲.政府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01):73-86.

[21]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05):731-745.

[22]陆懿.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作用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23]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43-57.

#### 注释:

1 发展指标: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收入状况、人口与环境;职能指标:经济调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管理。